

瓦哈比与威斯特伐利亚：沙特对 圣城麦加的合法性建构*

• 钮 松

[内容提要] 作为第一圣城，麦加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对于当前掌控圣城的沙特王国而言，麦加具有双重的合法性意义，这在现代沙特王国的发展历程中，集中体现在三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及其后续事件上。1924年沙特王室吞并麦加，标志着沙特融入现代国际体系及哈瓦比派全球扩张的发轫。1979年麦加禁寺事件，标志着沙特开始应对威斯特伐利亚的“宗教回归”。1987年麦加“城市国家”论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民主化，带出了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独享麦加、主导朝觐是否走向终结的疑问。自伊本·沙特开国起，沙特主动参与现代国际体系，以独立主权国家身份参与

*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中的伊斯兰朝觐研究”、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伊斯兰朝觐政治研究”（项目编号：13CZJ017）的资助。

国际关系，并以瓦哈比化的麦加为基础，以“伊斯兰盟主”身份参与主导伊斯兰世界事务。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趋势日愈明显，国际组织作为新的国际行为体的日趋频繁，麦加对于沙特的双重合法性身份在转型的国际体系中得到了更多的保障，也遭遇了更多的挑战；沙特也将全球朝觐管理事务与年度性麦加朝觐的具体组织职能相剥离；哈瓦比派从现代国际体系的边缘角色迈向更加关键的地位，其招致的误解与误读也更加显而易见。哈瓦比与威斯特伐利亚，是沙特将麦加纳入版图并有效治理90余年的基石所在，沙特的政教联盟体制也因这两大要素的高度聚合而得到巩固，得以成功应对来自国内与国际的双重挑战。

〔关键词〕 瓦哈比派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伊斯兰朝觐 麦加 合法性

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建国与独立，与伊本·沙特国王的审时度势有着密切关联。伊本·沙特的祖先创建了第一和第二沙特王国，盛极一时。他野心勃勃，不但努力恢复家族的王权荣耀，还在新一轮建国大业中审时度势，与笃信伊斯兰瓦哈比主义的谢赫家族开展政教结盟和血缘联姻。在与大英帝国及希贾兹王国的三边关系中，他孤立英国、吞并希贾兹，最终废除了与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沙特王国获得独立。第三沙特王国是少数几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便获得独立身份与主权地位的中东国家。纵观伊本·沙特的征战史，将伊斯兰圣城麦加纳入王国的版图，对于沙特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谢赫家族主导的瓦哈比

主义将宗教与政治相结合，有着征服麦加并将其瓦哈比化的强烈意愿，对掌控麦加的圣裔构成了宗教挑战。另一方面，希贾兹王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出席了巴黎和会，而此时，沙特王室领导的纳季德王国仍处于英国保护下的半独立状态。麦加是希贾兹王国的首都，若能攻而克之，对于最终消灭希贾兹王国的主权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总而言之，伊本·沙特国王游走于瓦哈比主义与主权原则所发轫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间，而这种双重合法性的契合点便在于圣城麦加。此后数十载，作为“伊斯兰盟主”的沙特因麦加和朝觐问题遭遇来自伊斯兰世界与国际社会的多重挑战，但沙特毫不妥协。其原因在于，对麦加的控制关乎王室乃至国家的存亡。瓦哈比主义是沙特王室对内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而融入现代国际体系、获取主权国家的外壳则是沙特王国对外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哈瓦比教派不可失去作为全球穆斯林精神中心的麦加，沙特王国不可失去作为其领土组成部分的麦加。圣城麦加与领土麦加构成了沙特王室统治合法性的两个面向。

一、1924年吞并麦加：沙特融入现代国际体系 及哈瓦比派全球扩张的发轫

从本质上来看，阿拉伯半岛是一个部落社会。这一特征即使在当今时代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1901年，伊本·沙特在流亡科威特10年后，征服了利雅得。这是他恢复家族荣光的首次尝试，后被视为现代沙特王国的建国开端。伊本·沙特所要面对的，是20世纪初阿拉伯半岛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强国角力。英国势力已渗透至波斯湾沿岸诸多部落，许多

部落依附于奥斯曼帝国或英国，以及名义上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希贾兹王国。该王国自 10 世纪以来便由哈希姆家族统治。至于阿拉伯半岛中部的纳季德地区，从未被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过。纳季德地区物产贫瘠、交通不便，恶劣的环境条件使其被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所忽视。这就为伊本·沙特最终统一纳季德提供了契机。他以征服利雅得为开端，逐步将敌对的拉西德家族所统治的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

自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以现代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现代国际体系开始在欧洲形成，并向外扩散。由于毗邻欧洲且与之有着多元往来，奥斯曼帝国也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之中。即便如此，只是在处理与欧洲国家及美国的关系时，奥斯曼帝国才会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出现。奥斯曼帝国在处理内部事务，尤其是治理偏远的阿拉伯半岛及北非地区时，更多地表现出传统的帝国属性：这些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与奥斯曼帝国苏丹之间仅为名义上的臣服和隶属关系。他们往往将自己视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导者，对于自身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认知缺乏现代主权国家观念。20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遭遇深重的统治危机，西方殖民大国的崛起不断冲击着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奥斯曼帝国不再是历史上让欧洲闻风丧胆的强国，而沦为“欧洲病夫”和“西亚病夫”。为了救亡图存，奥斯曼帝国逐步将视线转向西亚地区。为了加强对当地尤其是圣城麦加与麦地那的实际控制，奥斯曼帝国在德意志帝国的支持下，开始建设希贾兹铁路。这条铁路连贯诸多西亚城镇，并最终通往麦地那与麦加。“多亏了巴格达铁路与希贾兹铁路，德国人坚信他们可以与结盟的奥斯曼

人一起包抄在印度与埃及的英国人。”^①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身兼苏丹与哈里发两职，当苏丹深陷国家主权危机时，哈里发则力图打通大马士革与麦加之间的铁路连接。其目的在于，以提升政权宗教合法性的手段巩固摇摇欲坠的苏丹世俗政权。正因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沙特王室的目标主要为恢复家族的传统控制区。此时，由于奥斯曼帝国强化了对希贾兹的控制，沙特王室暂时不敢染指麦加。但沙特王室也注意到，英国、希贾兹王国以及铁路沿线的贝都因部落都极为抵触奥斯曼帝国的铁路计划，甚至不惜发动暴力袭击。例如，“1916年6月9日，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与阿里切断了麦地那附近的铁路，并且在次日，土耳其人在整个希贾兹都遭到袭击。”^②

1913年，伊本·沙特利用奥斯曼帝国在意土战争中的劣势以及从阿拉伯半岛抽调军队赴欧洲前线的有利时机攻克了哈萨，其统治区随之触及海湾沿岸。伊本·沙特不仅察觉到英国对于海湾沿岸地区的覬覦和关切，对奥斯曼帝国的衰颓之势亦了如指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被卷入战争之中。伊本·沙特开始攻城略地，并借英国势力抗击脆弱的奥斯曼帝国。1915年，他虚与委蛇，与英国达成《达林条约》，使得纳季德正式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这也标志着伊本·沙特与奥斯曼帝国的正式决裂。随着伊本·沙特不断壮大，阿拉伯半岛上出现了沙特王室、哈希姆家族、拉西德家族“三足鼎立”的新局面。1916年的阿拉伯大

^① Murat Özyüksel, *The Hejaz Railwa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Modernity, Industrialisation, and Ottoman Decline*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 Co. Ltd, 2014), p. 146.

^② F. E. Peters, *The Hajj: The Muslim Pilgrimage to Mecca and the Holy Plac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22.

起义给予奥斯曼帝国致命一击，在英国的帮助下，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驱逐了奥斯曼军队，并建立起以麦加为首都的希贾兹王国。侯赛因·伊本·阿里成为麦加的唯一统治者，由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正是由于麦加的伊斯兰圣城地位，其归属之变化必然会产生政治影响。一方面，作为圣裔的侯赛因·伊本·阿里试图以圣城为中心成为“阿拉伯之王”，但他自立为王的行为没能获得协约国的承认。因为，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分割，协约国有着不同的考虑。另一方面，失去麦加后，奥斯曼帝国政权的宗教合法性遭受巨大削弱。失去圣地使得“哈里发”头衔失去了内核与意义，从而为凯末尔将军于1924年废除哈里发制度提供了契机。即便如此，侯赛因仍试图从凯末尔手中接过“哈里发”一职，“他渴望哈里发国，但没有抓住它。这使得他得以幸免，被视为合法性权威的一个篡位者。”^①

凯末尔领导的共和革命将奥斯曼帝国彻底改造成一个拥有绝对主权的欧洲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受此影响，伊本·沙特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改变。他开始从一个努力恢复祖先荣耀的部落首领，转变为谋求国际承认的独立主权国家领导人。此时，希贾兹王国是伊本·沙特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唯一劲敌。伊本·沙特之所以尊重英国在海湾沿岸诸多部落的利益，其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地方的实力难以与伊本·沙特匹敌。伊本·沙特渴望夺回麦加，不仅是因为其祖先曾统治该城，还因为希贾兹王国已经在巴黎和会上先行获得了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家主权与独立地位。相比之下，伊本·沙特的纳季德仅为英国保护地，未能取得国际合法身

^① Joshua Teitelbaum, “‘Taking Back’ the Caliphate: Sharif Husayn Ibn ‘Alī, Mustafa Kemal and the Ottoman Caliphate,” *Die Welt des Islams*, vol. 40, no. 3 (Nov. 2000), p. 424.

份。由于缺失主权身份，外加国际体系参与度严重不足，伊本·沙特在与希贾兹王国的博弈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战胜希贾兹王国、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关键在于麦加，因为该城作为首都关乎希贾兹王国的存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忙于武力干涉土耳其共和国，无暇他顾。伊本·沙特利用这一时机，于1921年建立纳季德苏丹国，向希贾兹持续扩张。1924年，希贾兹王国首都麦加被伊本·沙特攻克。这不仅意味着作为主权国家的希贾兹王国濒临覆灭，也意味着，伊本·沙特终于将自己的王国领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大门。

伊本·沙特虽然是一个旧式的部落领袖，但他在建国过程中亲身经历了英德殖民大帝国对阿拉伯半岛的争夺，也见证了母国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与欧化转型。沙特的对手希贾兹王国积极参与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英法则通过1916年《塞克斯—皮克特协议》，人为制造出伊拉克等国。在这些重大事件的耳濡目染之下，他深谙现代国际关系的原则与规范，在大国之间进退自如、游刃有余。更为关键的是，伊本·沙特所谋求创建的，是一个披着主权外衣的部落聚合体。他深知阿拉伯半岛内外有别，开始利用西方世界的规范与原则参与大国外交。这种高明的政治手腕在同时代的阿拉伯领袖中极为罕见，是沙特成为中东地区少数几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根本原因。当然，沙特的成功也离不开有利的外部环境。一方面，英法等国在大战结束后忙于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西亚北非地盘，凯末尔则奉行与阿拉伯世界脱钩的政策。另一方面，由奥斯曼帝国建设的希贾兹铁路基本处于废弃状态，不堪使用。因此，大国对希贾兹的干涉在战略上力不从心，在战术上也困难重重。1924年，纳季德苏丹国一举攻克麦加，

而英国的反制措施仅限于停止经济援助。此前，希贾兹国王侯赛因凭借封“阿拉伯之王”之举，挑战了殖民大国在阿拉伯世界的统治，却也令该王国陷入某种程度的合法性危机。而伊本·沙特的目标则相当明确，那就是统一纳季德、希贾兹及附属地区。与伊本·沙特相比，侯赛因更像一个潜在的国际秩序挑战者。1926年1月，伊本·沙特在麦加就任希贾兹国王。1927年1月，他将纳季德苏丹国改为纳季德王国。1927年5月，伊本·沙特与英国签订《吉达条约》，希贾兹王国与纳季德王国正式合并为希贾兹兼纳季德王国。《吉达条约》保障了沙特的独立地位，赋予伊本·沙特对希贾兹地区的主权，标志着希贾兹王国的彻底覆灭。“阿拉伯的劳伦斯”（T. E. Lawrence）在阿拉伯民族大起义爆发时曾呼吁，“当土耳其战败的时候，各战胜国可以依据条约从苏丹那里获取麦地那，并将其赋予侯赛因，伴随着希贾兹的法律主权一道，作为对他忠实服务的奖励。”^①然而，仅仅10年不到，希贾兹王国便江山易主，这与侯赛因抗议《贝尔福宣言》、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有着莫大关联。伊本·沙特则根本不触碰这些问题，从而避免了与英法列强发生正面冲突。1932年，希贾兹与纳季德王国和哈萨、盖提夫等地合并，沙特阿拉伯王国正式成立。

与伊本·沙特有所不同，与其结盟的谢赫家族掌握着哈瓦比教权。历史上，瓦哈比派曾统治过麦加。因此，瓦哈比派将夺回麦加视为其宗教使命。根据传统，麦加宗教领袖由圣裔担任，享有极大的宗教自主权。1908年，侯赛因被奥斯曼政府册封为麦加大谢里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麦加的宗

^①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London: Wordsworth Edition Ltd, 1999), p. 119.

教、政治与经济生态与纳季德大相径庭，其中充斥着城市定居民与游牧民之间的文明碰撞。麦加被视为宗教之城与文化之城，各国穆斯林借朝觐之机前往此地或定居于此，其文化具有开放与多元的色彩，经济方式则以服务朝觐者为主。而纳季德的居民则以贝都因部落为主，民风粗犷散漫。正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瓦哈比派得以滋生。瓦哈比主义针对阿拉伯半岛以及奥斯曼帝国的诸多问题，从革新教义的角度针砭时弊。根据瓦哈比的观点，诸多奢靡、腐败、崇拜圣徒、劫掠朝觐者、商业盘剥、饮酒作乐等做法背离了伊斯兰的原则，而净化社会的方法便是回到伊斯兰创教的最初状态，建立一个只遵循《古兰经》与圣训且严格奉行“认主独一”原则的理想伊斯兰社会。此外，瓦哈比主义还带有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色彩，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尤其排斥由奥斯曼帝国苏丹所兼任的哈里发。瓦哈比派的开创者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他在18世纪末传教之初，便与沙特家族结成联盟，并由此开始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以这一联盟为基础，历史上的第一和第二沙特王国相继建立。1805年，瓦哈比派首次攻克圣城麦加与麦地那，极大增强了其宗教自信。“沙特埃米尔大胆谴责奥斯曼苏丹，并质疑他自称为哈里发和希贾兹圣城守卫者的合法性（validity）。事实上，瓦哈比派阻止其为那些谋求年度性朝觐而走上前往麦加之路的朝觐者的巨大旅队提供保护长达十年。”^①在瓦哈比派看来，麦加与麦地那是伊斯兰教兴起与壮大之地，控制圣城便拥有了同伊斯坦布尔的哈里发争夺宗教领导权的资本。当奥斯曼帝国剿灭第一和第二沙特王国后，瓦哈比派与沙特家

^① Elizabeth Sirriyeh, "Wahhabis, Unbelievers and the Problems of Exclusivism," *Bulletin: British Society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6, no. 2 (1989), p. 123.

族被迫流亡，在英国保护下的科威特积蓄力量。自1901年起，在瓦哈比派的再度支持下，伊本·沙特开启新一轮建国实践。瓦哈比派也将夺回圣地视为其自身发展壮大关键步骤。

此时，瓦哈比派的宗教合法性并非不受挑战。由奥斯曼帝国苏丹所兼任的哈里发和奥斯曼政府任命的麦加大谢里夫都是瓦哈比派的有力对手，后者的威胁性尤甚。自侯赛因于1908年就任麦加大谢里夫以来，他一方面臣服于奥斯曼帝国，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对英关系。侯赛因深知，纳季德的瓦哈比派对麦加觊觎已久，因而十分警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帝国战败解体，侯赛因用武力驱逐了土耳其人，并以麦加为首都建立了独立的希贾兹王国。侯赛因在建国一事上颇为顺利，却在宗教事务上遭遇了挑战。1916年阿拉伯起义爆发后，奥斯曼帝国于同年7月任命阿里·海答尔帕夏为新的麦加大谢里夫。但侯赛因拒绝服从，把持大谢里夫一职不肯放手。1917年3月，阿里·海答尔离开希贾兹前往大马士革，其麦加大谢里夫头衔直到1919年才被奥斯曼帝国降旨废除。凯末尔革命后，土耳其虽暂时保留了哈里发一职，但哈里发的命运已是朝不保夕，其宗教权威亦受到巨大冲击。在此情形下，侯赛因在朝觐问题上与瓦哈比派的纳季德矛盾不断。他甚至拒绝纳季德人前往麦加朝觐，引发瓦哈比派的强烈不满。1922年5月22日，英国在吉达的代理人发现，侯赛因“完全拒绝接受通过陆路而来的纳季德朝觐者”，“他们的瓦哈比意识形态，国王声称，极为可能使其敌人挑起当地的暴乱。”^①为此，英国驻巴格达的政治官员帕西·考克斯

^① F. E. Peters, *The Hajj: The Muslim Pilgrimage to Mecca and the Holy Places*, pp. 332 - 333.

(Percy Cox) 爵士特意约见由英国册封的伊拉克国王——侯赛因之子费萨尔。费萨尔声称，阿拉伯半岛的紧张局势完全是其父疯狂的固执所致。但他也希望，英国人能说服伊本·沙特，令其为了伊斯兰教的整体利益而叫停纳季德人的圣地朝觐。这种要求自然无法被纳季德方面所接受。最终，英国提出了折中方案：伊本·沙特应将朝觐人数减到最少，而侯赛因则必须接受他们。按照侯赛因的条件，伊本·沙特同意仅派出城镇居民作为朝觐者，而非狂热的部落民。1922年7月30日，1800名纳季德朝觐者抵达麦加，大部分为城镇居民，其中100人被武装起来并高举瓦哈比旗帜，但侯赛因对此视而不见。^① 1923年，协约国与土耳其达成《洛桑条约》，土耳其的国际处境有了巨大改善。凯末尔开始着手废除奥斯曼帝国的残余象征以及其西化道路的阻碍——哈里发制度。1924年3月，土耳其正式废除哈里发职务，伊斯兰教尤其是逊尼派延续了1300余年的宗教领袖从此不复存在。作为麦加大谢里夫和希贾兹国王，侯赛因利用此契机自封为新任哈里发，但没有获得伊斯兰世界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侯赛因建立哈里发国的梦想由来已久，“获得哈里发国的渴望在其发动起义抗击奥斯曼人的抉择中扮演了关键作用。如果侯赛因拥有了它，他进行反叛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希贾兹王国，也不单单是一个大的阿拉伯国家，而是建立一个替代的伊斯兰政体，在哈希姆家族领导下的阿拉伯人将会在里面获得他们合法的地位。”^②

① F. E. Peters, *The Hajj: The Muslim Pilgrimage to Mecca and the Holy Places*, pp. 333 - 334.

② Joshua Teitelbaum, " 'Taking Back' the Caliphate: Sharif Husayn Ibn 'Ali, Mustafa Kemal and the Ottoman Caliphate," p. 412.

哈里发被废除后，瓦哈比派的传播障碍大为减少。但是，侯赛因自封哈里发的行为引来瓦哈比派的不满。与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一样，瓦哈比派也不属于哈希姆家族后裔。因此，对于哈里发一职回到哈希姆家族可能产生的宗教挑战，瓦哈比派始终保持警惕。此后不久，瓦哈比派于1924年10月攻克麦加，12月攻克麦地那。在麦加沦陷前夕，侯赛因将王位和麦加大谢里夫职位传于长子阿里·伊本·侯赛因，自己随之逃亡塞浦路斯，并最终前往其子阿卜杜拉担任国王的外约旦定居。在此期间，他仍保留所谓“哈里发”头衔直至1931年去世。1925年底，希贾兹被瓦哈比派彻底征服。阿里·伊本·侯赛因逃往巴格达，其麦加大谢里夫职位从此失去实质意义，国王王位则被伊本·沙特获取。自1924年攻占麦加后，瓦哈比派再无对手，随即获得新生。在瓦哈比派的全力支持下，沙特阿拉伯坐拥麦加，以“伊斯兰盟主”的身份参与国际关系，并利用瓦哈比主义改造朝觐、改造麦加。20世纪30年代，作为沙特支柱产业的朝觐经济受到“大萧条”的猛烈冲击，沙特开始转向石油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沙特的石油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20世纪70年代，沙特逐步收回石油主权，国力进一步增强。沙特以巨额石油美元为后盾，大力推进瓦哈比主义的全球传播，同时积极提升朝觐接待能力。沙特不仅是G20成员国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还与土耳其一道，成为G20中仅有的两个伊斯兰国家。瓦哈比派虽然只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细小分支，却得益于麦加的至圣地位和沙特王国的实力增长，从伊斯兰教的边缘走向核心，从弱势走向强势。综上所述，1924年是瓦哈比派走上全球扩张之路的发轫之年。

二、1979年麦加禁寺事件：沙特开始应对 威斯特伐利亚的“宗教回归”

当伊本·沙特与瓦哈比派联合夺回麦加后，该城成为沙特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如此，麦加还凭借其圣城地位和年度朝觐活动，成为瓦哈比派发展国际影响力的大本营。此后数十年，沙特国家的主权利益与瓦哈比派的宗教利益共同聚焦于麦加，这也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去宗教化”本质相契合。现代国际体系起源于三十年战争后的欧洲。天主教与新教两大阵营围绕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问题征战了30年，最后以新教获得合法地位而告终。在欧洲历史上，这场战争以其伤亡之惨烈、时间之持久、交战国之多，直接导致了世俗民族国家的兴起。战后，作为冲突根源的宗教事务开始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去魅”。《威斯特伐利亚公约》以三十年战争的经验教训为基础，梳理出新的国际关系理念并加以规范化。欧洲列强向域外殖民扩张的历程，也是现代国际关系规范走向世界的过程。虽然在现实利益的裹挟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冲突不断，但两者皆为天启宗教，理念上具有某种亲缘关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发源于基督教的欧洲，但其“宗教祛魅”的精神内核在伊斯兰世界亦颇有市场。坐拥两大伊斯兰圣城的希贾兹王国便以战胜国身份出席巴黎和会，成为阿拉伯历史上首个真正的独立主权国家。吞并希贾兹王国后，伊本·沙特并未立即将其与纳季德合并，而是以纳季德苏丹的身份兼任希贾兹国王。此举不仅有利于平稳过渡，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伊本·沙特善于从现代国

际关系的视角来思考希贾兹王国的国际身份与地位。两个王国合并以后，保守的瓦哈比派并未反对伊本·沙特的对英外交，同时接受了新王国的主权身份。瓦哈比以麦加为大本营，其宗教挑战主要针对其他教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冷战接踵而至，东西方的两极格局在宗教上被解读为无神论与有神论之战。从这个角度出发，沙特等保守伊斯兰宗教大国纷纷与基督教西方结盟，与之相对，大力推进世俗化与社会主义的中东国家则偏向苏联。这在事实上反映出宗教对现代国际体系的“复仇”。“冷战结束后，一方面，该体系所确立的主权国家基本单元地位进一步受到挑战，超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关系的领域和深度都有前所未有的提升；另一方面，该体系所确立的‘去宗教化’及其异化‘去神学化’，正遭遇宗教全球复兴的挑战，宗教信徒、宗教团体、宗教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① 即便如此，从现代国际关系的整体格局来看，在自1648年以来的300余年内，宗教一直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一种“韬光养晦”的状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宗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从‘韬光养晦’到‘显山露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其中，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可以说是全球宗教发展趋势的重要转折点。这次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阿拉伯世界世俗民族主义的失败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崛起。”^② 这一事实也引发了对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宗教合法性问题的思考，对于沙特而言，反思尤为必要。美苏在中东的争夺以及代理人战争的加剧、

^① 钮松：“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际体系中的宗教合法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3日。

^② 徐以骅：“宗教在1979”，载《中国民族报》，2016年4月5日。

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分歧与内耗、作为伊斯兰第三圣地的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完全控制、国内什叶派势力的蠢蠢欲动，这些危机都引起了沙特王室和瓦哈比派的高度警觉，而1979年的麦加禁寺事件不仅成为沙特内政与外交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整个1979年国际涉教重大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宗教在当代国际关系上真正‘登堂入室’的年份是1979年。该年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政治、社会和宗教事件，意义十分深远”，“全球‘宗教反叛’并非始于1979年，但1979年肯定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①

1979年1月16日，在经历了几乎一年的示威与激烈抗议活动之后，伊朗巴列维国王以世俗化为基础的“白色革命”彻底失败，其本人也流亡海外。就在巴列维国王出走后不久，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于1月28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一）抵达美国，开启了被称为“旋风九日”的访美活动。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流亡海外多年的大阿亚图拉霍梅尼于2月1日从法国飞回伊朗接管国家权力。邓小平的赴美访问除了改善中美政府关系，还就美方关心的《圣经》印刷和开展自主宗教活动作出了积极回应。基督教成为后传教时代中美关系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向卡特总统传话，期望以恢复朝觐为突破口，试图发展对沙关系。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式成立。伊朗局势的急速逆转震惊了国际社会，一种宗教与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相糅合的新的神权政体开始出现在国际舞台之上。一夜之间，伊朗已不再是那个高度世俗化的中东亲美君主国，这一突变让美国无所适从。4月8日，宁波百年堂成为“文革”后中国大陆第一个开放的教堂。6

^① 同上。

月，美国基督教宗教新右翼的代表“道德多数派”正式成立。几乎与此同时，6月2至10日，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回到其母国波兰，展开了另一场“旋风九日”，被视为东欧剧变的开端。7月16日，萨达姆当选伊拉克总统。一年后，他将与海湾君主国结盟，共同抵御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输出。中国宗教公共外交也得到大力推进：8月25日至9月9日，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第三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10月31日，“文革”后的首个中国大陆穆斯林朝觐团在安士伟阿訇的带领下前往麦加朝觐，中沙民间交流正式得到恢复。11月1日，经伊朗“专家会议”确认，霍梅尼担任第一任法基赫系统领袖，正式成为伊朗的最高首脑。与此同时，他称美国为“撒旦”，其挑衅姿态溢于言表。11月4日，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伊朗人质危机爆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斡旋下，5名女性和8名非洲裔人质于11月19至20日被释放，他们被称为“幸运十三”。就在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全世界朝觐者齐聚沙特、开展宗教活动之时，11月20日（伊斯兰历1400年1月1日），宗教极端主义武装分子占领了麦加大清真寺，并劫持各国朝觐者作为人质。直到12月初，经过瓦哈比派“法特瓦”的许可，沙特武装力量开赴现场解救，人质危机方才平息。此事引起了沙特青年富商本·拉登的共鸣。12月25日圣诞节过后，苏联军队开始入侵阿富汗，企图颠覆当地政权，从而激起了长达十年的全球伊斯兰圣战士的抗苏战争。在此期间，本·拉登开始资助阿富汗游击队。十年的阿富汗战争拖垮了苏联，也壮大了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总而言之，1979年关乎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登堂入室”，如新的国际行为体的出现、宗教极端主义的暴力化、宗教公共外交的崛起。正是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思

潮与制度的影响，在麦加禁寺事件中，沙特逊尼派极端主义力量提出了推翻王室和瓦哈比派乌里玛阶层的统治、建立“马赫迪国”的政治蓝图。沙特什叶派更是利用宗教信仰分歧，反抗处于主流地位的逊尼派对国家的统治。

麦加禁寺被占事件的幕后指使者为43岁的沙特人朱海曼·乌泰比（Juhayman al-Otaybi）。1936年，朱海曼生于卡西姆省贝都部落民组成的“伊赫万”定居点。此时，沙特王国业已成立。伊本·沙特的建国与独立离不开英国的支持。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了“伊赫万”的叛乱，其矛头直指沙特王室和哈瓦比派乌里玛阶层。叛乱分子认为他们投靠英国人，背离了伊斯兰，这场叛乱直到1930年才被镇压下去。朱海曼的父亲、祖父以及其他亲戚均参加了“伊赫万”叛乱。1955—1973年，朱海曼在沙特王室的心腹武装——国民卫队中服役。退役之后，他前往麦地那，深受萨拉菲学者阿卜杜·阿齐兹·伊本·巴兹的影响。除了家族的“伊赫万”反叛背景以及自身的宗教修养外，整个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沙特王室与“异教徒”美国的结盟，都对朱海曼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既反对沙特王室，又反对瓦哈比乌里玛的王权和教权，甚至反对现代科技产品，其理念和做法与数十年前的先辈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在于，其影响更加国际化。朱海曼大肆嘲讽瓦哈比派乌里玛：“他使用‘国家伊斯兰’（state Islam）这个词来描绘某种局面，即穆斯林接受一个异教徒国家的统治，并且乌里玛向腐败的统治者提供忠诚以换取荣誉与财富”，“朱海曼的许多思想可以追溯到对伊赫万的怀恋和对穆斯林兄弟会

处境的同情。他思想独特的一个方面是其千禧年观。”^① 朱海曼率领数百名宗教极端分子占领麦加禁寺后，向被困在其中的各国穆斯林宣称，其27岁的内弟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卡赫塔尼已成为“马赫迪”。此事引发全球穆斯林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如何妥善、合法地消灭恐怖分子并夺回麦加禁寺，成为沙特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粉碎朱海曼及其追随者的“马赫迪国”迷梦，不仅有利于巩固王室统治、维护沙特的主权完整，也有利于瓦哈比派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化解宗教合法性危机而赢得伊斯兰世界的认可。

朱海曼及其追随者携带着大量武器和后勤补给，可谓有备而来。例如，有人亲耳听到“大部分是苏联制造的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和以色列生产的乌兹冲锋枪”，^② 但在沙特武装力量面前实在不堪一击。虽然力量羸弱，但朱海曼的人马占据了至圣的麦加禁寺，掌握着被囚朝觐者的生杀大权，使得沙特王室不敢贸然攻入。一方面，《古兰经》和圣训禁止在麦加圣城以及清真寺杀戮，另一方面，交火可能造成诸多人质伤亡。事发后，沙特王室面临来自全球穆斯林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麦加禁寺被占领暴露了沙特在维护圣地安全方面存在着巨大漏洞，但麦地那先知寺的幸免也得益于哈瓦比派领袖的及时应对危机。在麦加禁寺被占不久，负责两大圣地事务的哈瓦比高级教士谢赫·纳赛尔·伊本·拉西德便接到从禁寺逃出的伊玛目伊本·苏贝尔（Ibn Subeail）的电话，从而知晓了此事。他被告知，现场传出了枪声。与苏贝尔通

^① David Commins, *The Wahhabi Mission and Saudi Arabia* (London: I. B Tauris, 2009), pp. 165 - 166.

^② Ziauddin Sardar, *Mecca: The Sacred City*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4), p. 327.

话结束后，伊本·拉西德立刻致电王宫，哈立德国王闻之倍感震惊，当即要求拉西德亲自上街、考察实情。拉西德发现，在禁寺南方，最接近现场的是一个理发店。当时通讯尚不发达，拉西德便跑回办公室。在那里，他刚好有2台电话机，一台用来接听事件最新进展，一台向国王汇报情况。拉西德此时意识到，这些神秘反叛分子可能会对伊斯兰第二大圣地麦地那的先知寺采取行动。他火速致电麦地那的当地代表，向后者发出警告。此人立刻将拉西德的预警转告当地长官阿卜杜穆赫辛（Abdulmohsen）王子，先知寺随即被封锁。^① 此举可谓不幸中的万幸，令沙特王室得以集中精力应对麦加的危局。一方面，沙特瞄准国际社会，博取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舆论同情：正在突尼斯召开的阿盟会议上各与会国一致谴责了麦加禁寺占领事件。另一方面，沙特瞄准国内，请求瓦哈比派高级教士发布“法特瓦”以为武力夺回禁寺提供宗教合法性。法赫德国王召集伊本·巴兹以及包括伊本·拉西德在内的其他29位高级乌里玛，外加从禁寺逃出的伊玛目伊本·苏贝尔等31人，共同前往利雅得马扎尔皇宫（Maazar）商议此事。他们发布“法特瓦”，谴责发生在圣地的暴行并允许沙特武力镇压。作为美国自1930年以来的盟友和全球主要的石油输出国，美国也高度关注麦加禁寺事件。尽管伊朗声称美国是幕后黑手并诱发了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被焚事件，美国依然给予沙特强有力的外交支持。不仅如此，美国还认为，此事件与伊朗有关。事发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刊登了头版头条——《占领麦加清真寺的武装人员据信来自伊朗》。文章引用一位美国官员的观点，认为麦加事件回应了霍梅尼

^① Yaroslav Trofimov, *The Siege of Mecca: The Forgotten Uprising in Islam's Holiest Shrin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7), pp. 78 - 79.

“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开展总起义”的号召。英国与以色列也与美国持同样观点。麦加禁寺事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西方对于伊斯兰的态度。“什叶派，由于霍梅尼对这些伊斯兰少数派的吸引力，如今注定是美国与西方的天然敌人。多数派的逊尼派，包括瓦哈比狂热分子，被默认为是温和的，即便不是完全的朋友。”^① 在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GIGN）的帮助下，经过沙特和巴基斯坦武装力量的联合清剿，禁寺最终于12月4日回到沙特手中。纳伊夫王子在电视新闻中通报了战果：沙特军方阵亡60人、受伤200人。75名叛乱者在禁寺中被击毙、170人被俘获。在被俘的23名妇女和儿童中，包括朱海曼的妻子，男性俘虏则包含埃及人、非洲人、巴基斯坦人和沙特贝都因人。一周后，纳伊夫王子在电视上透露，叛乱分子总共死亡117人，朝觐者死亡26人。可以确定国籍的有沙特人、巴基斯坦人、印尼人、印度人、埃及人和缅甸人。受伤的有110人，包括印尼人、阿富汗人、尼日利亚人和美国人。^②

麦加禁寺事件对沙特的打击是沉重的。此后，对于任何利用圣城麦加的特殊宗教地位或年度朝觐之机、危害主权和瓦哈比统治的行为，沙特都保持高度警惕。沙特愈发对伊朗什叶派的激进外交感到忧虑。除了全力支持萨达姆抗击什叶派革命输出以外，沙特与其他5个海湾阿拉伯君主国联合自强，于1981年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开启了海湾地区一体化的实践。在国际关系“宗教回归”的大背景下，教派冲突与民族冲突构成了沙特与伊朗之关系的两个面向。朝觐争端

^① Yaroslav Trofimov, *The Siege of Mecca: The Forgotten Uprising in Islam's Holiest Shrin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7), pp. 96 - 97.

^② Ibid., pp. 222 - 224.

既是两国矛盾的交汇点，如1987年伊朗朝觐冲突、2016年的朝觐争端，也是两国关系改善的突破口，如2007年内贾德总统受邀朝觐。沙特的基本原则是：在牢牢把握麦加城市建设管理权和朝觐服务控制权的前提下，通过伊斯兰合作组织让57个成员国适度参与、协商朝觐相关事务。换言之，沙特政府在确保国家主权和瓦哈比派优先地位的同时，在朝觐问题上让渡了部分主权，并对其他教派保持宽容。通过1979年麦加禁寺等一系列事件，沙特政府切身感受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宗教回归”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沙特大力推进以麦加为核心的朝觐外交，旨在以朝觐为纽带、吸纳更多国家的穆斯林前往麦加。这在沙特迈向后石油时代的大背景下具有显著的特殊意义。受其影响，许多拥有大量穆斯林的非伊斯兰国家也开始大力推进以朝觐为导向的宗教公共外交。得益于宗教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合法性不断提升，沙特及有关国家的朝觐公共外交颇具成效，有望实现良性互动。

三、1987年麦加“城市国家”论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民主化：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独享麦加、主导朝觐的终结？

自1979年以来，战后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趋势日益明显，而伊朗什叶派则咄咄逼人地向全球输出革命。沙特与伊朗的关系本来便带有民族与教派的“新仇旧恨”，此时更是蒙上了阴影。沙特力挺伊拉克，利用两伊战争抵御伊朗在海湾地区大肆兜售的什叶派神权共和思想；伊朗则以年度朝觐为契机，大肆开展反美反以游行示威活动，并高举霍梅尼画

像。伊朗的朝觐政治化遭到沙特的强力抵制乃至镇压，这在1987年伊朗朝觐事件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两国关系由此陷入巨大困境。最为重要的是，伊朗方面在1987年宣称，结束沙特对麦加的统治、在麦加建立一个独立的由全球穆斯林共管的城市国家。这直接挑战了沙特和瓦哈比派独享麦加的合法性。事实上，建立全球信徒共同分享主权与治权的独立宗教圣地国家并非霍梅尼的首创。此类构想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扩张过程中已有成功先例，如1929年梵蒂冈城国的诞生。

自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后，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可谓顺风顺水。在历史的变迁中，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与东方正教。天主教始终以罗马城为核心，在亚平宁半岛中部建立起一个教皇国。这是一个城邦与领地的共同体，经历了覆灭与重生。在中世纪，教皇不但掌握着西欧地区的最高宗教权力，还依靠教皇国行使世俗君主的统治权。1848年欧洲革命后，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欧洲，长期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城邦开启了意大利统一的战争。在意大利军队攻克罗马之前，意大利国王提出，将罗马城西部留给教皇以便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却遭教皇拒绝。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军队攻陷罗马，教皇退守梵蒂冈城内，并自称“梵蒂冈的囚徒”。由于意大利保守力量的反对以及教皇国曾经的主权地位，意大利并未将梵蒂冈合并。教廷与意大利之间开启了长期的对立，直到1929年2月11日，墨索里尼政府与教廷达成《拉特兰条约》。教廷正式承认罗马为意大利首都，意大利则承认教皇在梵蒂冈城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世俗统治权力。^①自此，在法理上，教皇国被梵蒂冈城国所取代。尽管梵蒂冈的领土仅

^① “Lateran Pacts OF 1929,” <http://www.aloha.net/~mikesch/treaty.htm> (登录时间: 2019年3月3日, 下同)。

有 0.44 平方千米，是全世界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但教皇利用其双重身份参与国际交往，在国际关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梵蒂冈城国作为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教皇是其国家元首，行使世俗统治权。另一方面，作为天主教领导中枢的罗马教廷坐落于梵蒂冈城内，教皇又可直接以教廷最高领袖的身份，行使针对全球天主教徒的宗教权力。梵蒂冈城国成为主权国家体系中较为独特的一种国家形式，它身兼领土迷你小国与宗教超级大国的双重特性。战后，意大利共和政府继续承认《拉特兰条约》的法律效力。以梵蒂冈城国为榜样，联合国的巴以分治决议最初试图将巴勒斯坦划分为阿拉伯国、犹太国和耶路撒冷三个部分。其中，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城，不属于任何国家，而是由联合国进行管理。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巴以冲突不断加剧，至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完全吞并了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转变为一个城市国家的可能性就此消失。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直谋求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因而巴以双方都不支持耶路撒冷的国际化。1979 年，在宗教圣城建立梵蒂冈式的城市国家的设想再度出现：当时，伊朗国内掀起了反政府浪潮，巴列维国王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1978 年 12 月 31 日，原属反对派国民阵线阵营的沙布尔·巴赫蒂亚尔被任命为首相。1979 年 1 月 16 日，国王流亡国外，巴赫蒂亚尔开启政治和解进程，释放政治犯、解散萨瓦克（秘密警察），并批准流亡海外 14 年的霍梅尼返回伊朗。新首相打算在什叶派大本营库姆建立一个梵蒂冈式的城市国家。霍梅尼于 2 月 1 日返回伊朗后，并不接受巴赫蒂亚尔领导的政府。他指出：“我要踢他们的牙齿。我指定政府。我在这个国家的支持下指定政府。” 2 月 3

日，霍梅尼威胁道：“不要惹我邀请人民开展一次圣战。”2月4日，巴赫蒂亚尔回应道：“作为一个穆斯林，我从未听过一场关于一个穆斯林针对其他穆斯林的圣战。我既不会与国王，也不会与霍梅尼妥协。我将不会允许阿亚图拉霍梅尼组建一个临时政府。一生之中有这么一个时间，一个人必须站稳脚跟并说不……我从未见过一本关于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的书，也没有见过其他任何人谋求那件事……一些围在此阿亚图拉身边的人如同暴力的秃鹫……这些神职人员应该到库姆去并在其周围修建一堵墙，创造他们自己的梵蒂冈。”^①然而，霍梅尼所要建立的神权共和覆盖整个伊朗，而非一个小小的库姆。库姆城国的设想最终湮灭在伊斯兰革命的洪流中。讽刺的是，伊斯兰革命结束以后，伊朗与沙特关系持续恶化，两国围绕朝觐的冲突开始加剧。为了缓和矛盾，伊朗正式呼吁在麦加建立城国。

在1987年的朝觐冲突中，200多名展开政治活动的伊朗朝觐者被沙特国民卫队击毙，沙特警方和其他朝觐者也伤亡甚众。此事导致伊朗对沙特的敌意更加强烈，控诉“圣城麦加被异教徒所统治”。为了反击伊朗的宗教挑衅，沙特于1987年10月在麦加召开国际会议，并耗费数亿美元用以造访全球600余位支持者。他们谴责伊朗什叶派煽动邪恶之火、对暴力恐怖主义漠然置之。伊朗则在1987年11月召开“保卫圣寺之神圣与安全国际会议”，号召“将麦加从‘沙特之爪’中‘解放’，以及国际穆斯林联合起来将圣城作为一个独立的城

^① Dan Geist, “A Darker Horizon”: The Assassination of Shapour Bakhtiar, August 6, 2011,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tehranbureau/2011/08/a-darker-horizon-the-assassination-of-shapour-bakhtiar.html>.

国来治理。”^① 尽管伊朗是非阿拉伯国家，但伊朗的梵蒂冈式麦加城国呼吁并未招致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反对。究其缘由，沙特在麦加城市管理方面确实存在诸多问题。首先，自1924年攻占麦加以来，沙特便开始按照瓦哈比派教义改造麦加，大批圣墓、圣址以及不符合哈瓦比教义的宗教建筑被彻底清除。即便在主流的逊尼派人士看来，这也是难以接受的。其次，在朝觐期间发生过多起踩踏事件，而这些安全事故与麦加城市改造设计中的缺陷有着莫大关联。沙特政府从未根除这些安全隐患。为了发展后石油时代的全新朝觐业，沙特政府无视专家意见，在麦加大兴土木，一边修建豪华酒店，一边继续扩建禁寺。此类商业行为更是破坏了麦加的宗教风貌。在1986年，沙特法赫德国王宣布将“陛下”之称改为“两圣寺监护人”（或“两圣城监护人”），意在进一步保障沙特独享麦加统治权的宗教合法性。历史上，“两圣寺监护人”最初为非正式头衔。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征服两大圣城后，此头衔开始延续使用。至奥斯曼帝国末期，由于苏丹兼哈里发对圣地的控制力不断被削弱，官方开始允许麦加实际统治者——哈希姆家族的麦加大谢里夫使用此头衔。伊本·沙特正式就任希贾兹国王以后，该头衔在此后的60年间已不再使用。因此，法赫德国王的改称意味着“两圣寺监护者”在伊斯兰教史上首次作为正式头衔而存在。这表明，他已经深刻意识到伊朗什叶派革命输出的威胁，以及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对沙特王室和瓦哈比派教士的不满。在哈里发已被废除的情况下，沙特的“两圣寺监护人”实际上具有某种哈里发的意味。沙特坚持本国对麦加的绝对主权，坚持按照哈瓦比派的

^① Martin Kramer, *Arab Awakening and Islamic Revival*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1996), p. 175.

教义重塑麦加，坚决反对所谓的麦加城国方案，但是，它又巧妙地将全球朝觐治理权从麦加主权中剥离，用以缓解来自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阵营的激烈批评。换言之，沙特在全球朝觐的具体组织上逐步让渡主权、放弃了主导地位，但仍坚持本国的朝觐总负责兼实施者身份。

除了全球朝觐治理事务的民主化，沙特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中的表现也彰显出它在麦加问题上“原则坚持与战术妥协相并存”的政治策略。伊斯兰合作组织成立于1970年，是目前全球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伊斯兰国际组织，其讨论的议题较为广泛，朝觐问题则是重中之重。沙特期望，通过伊斯兰合作组织共同解决全球朝觐管理中的问题，从而在麦加归属问题上彻底孤立伊朗。“虽然对朝觐的正式管辖权仍保留在沙特手中，但伊斯兰合作组织负责制定朝觐政策并实施监督”，“OIC是关于朝觐妥协机制的设计师。妥协机制为伊斯兰国家提供了一个论坛，可以将朝觐改革与对许多问题的讨价还价联系起来。相互竞争的国家乐于接受有关朝觐政策的交易，因为他们愿意在那些与朝觐本身无直接关联但又同等重要的领域中做出让步。”^① 沙特利用伊斯兰合作组织中的三大集团（阿拉伯集团、亚洲集团和非洲集团）间的相互博弈与制衡，以朝觐为切入点、以石油美元为后盾、以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权力民主化为手段，换取各伊斯兰大国在麦加主权上对沙特的支持。沙特“收买与孤立并举”的战略确实让“麦加城市国家论”基本失去了支持者，但麦加的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水平、朝觐名额分配、沙特政府和外交机构在朝觐事务上的运行水平与效率都会不时诱发各种针对麦加未来国

^①（美）罗伯特·比安奇著，王佳尼、钮松译：“世界政治与国际法视野下的朝觐制度”，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3期，第44页。

际地位的论争。

结语

麦加不仅是伊斯兰第一圣城，也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对于当前掌控圣城的沙特王国而言，麦加具有双重的合法性意义。在现代沙特王国的发展历程中，这种意义集中体现在三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及其后续事件上：1924年，沙特王室吞并麦加，标志着沙特融入现代国际体系及哈瓦比派全球扩张的发轫。1979年的麦加禁寺事件标志着沙特开始应对威斯特伐利亚的“宗教回归”。1987年，麦加“城市国家”论兴起、伊斯兰合作组织出现民主化趋势，由此带出了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能否独享麦加、主导朝觐是否走向终结的疑问。从伊本·沙特开国开始，沙特主动参与现代国际体系，以独立主权国家身份参与国际政治，并以瓦哈比化的麦加为基础，化身“伊斯兰盟主”领导伊斯兰世界。此后，国际体系发生转型，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趋势日愈明显，国际组织作为新的国际行为体发展迅猛。在转型的国际体系中，麦加带给沙特的双重合法性可谓有利有弊：一方面，沙特将全球朝觐管理事务与年度性麦加朝觐的具体组织职能相剥离，从而获得了外交灵活性。另一方面，哈瓦比派从现代国际体系的边缘迈向中心，其招致的误解与误读也将更为明显。纵观历史，哈瓦比与威斯特伐利亚的精妙平衡，是沙特将麦加纳入版图并有效治理90余年的秘诀所在。得益于上述两大要素的高度聚合，沙特的政教联盟体制较为稳固，能够成功应对来自国内与国际的双重挑战。

著（译）者简介

肯尼斯·D. 沃尔德（Kenneth Wald）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杰出教授

阿利森·卡尔洪—布朗（Allison Calhoun - Brown）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苏尼尔·卡里亚卡拉瓦纳（Sunil Kariyakarawana） 英国皇家陆军神职人员

汪 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钮 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贾付强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李 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章志萍 海军军医大学外语教研室副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